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

袁 钰

内容提要 “中体西用”文化观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本文通过对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人认识和学习西学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文化观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三十余年长盛不衰,成为部分官方或非官方、主流派或非主流派文化人士尊奉的文化观念准则、规范,辛亥革命后逐渐式微。可以说,作为转型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中体西用”文化观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本文试图通过对其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来考察它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体西用”文化观,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而要考察西学输入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当时耶稣会士到中国以学术传播为手段进行传教,中国人便开始把西方学术(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概称之为“西学”,那时西学传入的规模并不大,传习的范围也很狭窄,西学的地位也不高,西书被打入《四库全书》的另册,“西学”被认为精于天文推算、工匠制作而拙于学理,“其道变幻支离,莫可究诘”。“而稳固世道人心者,非穷理尽性的中学莫属”。这大约就是“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原型。

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隆隆炮声中被迫打开了大门。鸦片战争中中华帝国的战败,刺激着进步的人士在新的时局下寻求探索挽救统治危机的方法,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向西方学习,学习其“长技”这一在今天看来可以理解的问题,在当时守旧派眼里,简直似洪水猛兽一样可怕。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独立发展的大国,有着源远流长、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输入西学必然引起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震撼和猛烈的冲突。但是,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它根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服务于现实生活”。“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不可能停止不前。”^①时代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生产力,而中国仍停滞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本来在文明史上遥遥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此时明显再无法显示出其优势,政治制度僵化、守旧,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文化制度更是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可见,此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方面需要适应时代需要而发生变化,虽然有守旧派的顽固反对,输入西学对于近代中国仍成为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人们顿开眼界。由此,林则徐、魏源等进步人士被称为近代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代表者。

“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蕴涵的,首先是看到并承认西方的长处,其次是学习西方的“长技”,用来抵御西方的侵略。在当时风气未开的环境中,“师夷长技”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及舆论的压力,加上传统文化对其的深刻影响,使魏源表明主张“师夷长技”的同时,仍坚持反对“夷教”,即不学西学之义理,但学西学之技艺。由此可以看出,魏源著《海国图志》时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中体西用”一类的论式,但已经有了近似的意念,魏源的主张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文化观诞生的思想渊源。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式的形成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二

冯桂芬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之时。他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老师林则徐以及龚自珍、魏源关于革新自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特别是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深刻地感受到中国“采西学”、“制洋器”的重要性。

1861年,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一书,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取夷为天下第一要政”。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本辅论”。根据冯桂芬的分析,中国至少在四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这四个方几乎囊括了中国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因此,冯桂芬在近代中国几乎最早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提出中国必须全面改革的要求。他继魏源之后,重申中国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不能满足于拥有外国的洋船洋炮,而要做到“能造、能修、能用”,即“能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否则,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终为人之利器为人利用。更要改革中国现有体制、文化方面的弊端,造就一批能适应现实需要的人材,如果这样做,必将收到“更善之善”的效果。从冯桂芬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比魏源前进了一大步,但应当看到,冯桂芬虽然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注意到向西方学习,但他所强调要学的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他和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仍忘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原本,作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的原则,但即使如此,其主张仍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冯桂芬的“本辅论”的时代作用在于首创出以“中体西用”类型的论式来提倡西学,开一代新风。可以说,正是从冯桂芬“本辅论”起,“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构架才成型,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为价值。也就是说,确保“伦常名教”所代表的既有政治秩序和道义信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陈规习见,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洋务运动,正是以“中体西用”作为其指导思想,“不是使固有文化适应‘近代’的变化,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在于仅仅局限于吸收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技。这种文化选择,充分表现了它的保守性和狭隘性,不能不导致归于失败的命运。”^②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等活动,都是在“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指导下,力图达到富强的目的,洋务运动的倡导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搞洋务的。三十年洋务运动,“伦理纲常”的前提始终没有变,但实质上,“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内容还是大有发展的,而且随着实践活动的一步深入,理论上的分析论证也越来越细密周详。

三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守旧派反对西学言论的刺激;二是洋务派对于西学认识的加深。

从西学输入近代中国之时起,就受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守旧派反复声言,只要整纪纲、守圣道、励气节、振民心,中国定可强盛起来,无须乎他求,更不应该效仿西人,舍本求末。他们把中学作为本,西学作为末,认为中国从来不用这样一些“奇巧末技”,照样出现过全盛之世,他们极力贬低乃至抹杀西学对于振兴近代中国的作用,对西学输入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捍卫中学排斥西学。面对这种情况,洋务派极力表示坚信礼教立国的中学具有主导作用,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论证西学对于富国强兵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这样,随着守旧派和洋务派争论的深入,洋务派对于西学认识的逐步加深,“中体西用”文化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魏源的“师夷长技”所重唯在强兵,富国一事是没有看重的,除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当时还不大懂得强与富之间的联系。到冯桂芬时的“本辅论”,强调的仍是以应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洋器”。随着洋务派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他们开始感到仅靠造船练兵将还远远不能达到自强,要想求强,必须先求富,强与富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必须走“寓强于富”、“先富后强”的道路,在此情况下,出现了“重商富民”的思想。

“重商富民”的重商不限于传统上狭义的重视商业,而是表示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讯、金融等实业。这种重商主张的形成,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在认识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认识其船坚炮利,到认识其自然科学和制造工艺,再到认识其富国有方,正是这样对西学的认识的一步深入,为“中体西用”文化观增添了新的内容,郭嵩焘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郭嵩焘 1875 年在总理衙门任职时,于《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了“重商贾以为循用西法立基”的主张,以十分明朗的态度阐发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见解,认为西洋立国之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

为末中一节，“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③在当时，守旧派以他们的“崇本抑末”论为武器，推崇、捍卫圣道祖训、贬抑和反对引进“洋学”、“洋器”之时，西洋“有本有末”论成了对守旧派崇本抑末论的有力驳斥。在这里，郭嵩焘只是想说明，中国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应当由浅入深，通过掌握西方立国之末，将来才能攀及其立国之“本”，即由末到本、循序渐进地进行。至于如何把西洋立国之本末都学过来，中国自己的那个“本”怎么处置呢？郭嵩焘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对西学了解的愈益深入，尤其是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了解愈多，“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和“中体西用”如何协调，成为时代提出的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王韬、郑观应等人开始批评洋务事业中的失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发挥了郭嵩焘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并进一步具体化，指明“西人立国”之体中包含“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这样关于政治制度的内容。可见，从郭嵩焘到郑观应，其体用观中已经引入了“西体”，洋务派的激进分子已经认识到要想学习西方致富强之“体”，就必须对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的“体”进行改革。可见，到此时，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本身在面临着尖锐的挑战。但如何从文化观念的层次上，做出接受“西体”的合理阐释，对于洋务派的思想家来说，还是很难解开的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这种论述已经显露出无法容下向西方学习经济政教的新内容。郑观应等人并没有改变祖宗法统与圣贤名教的自觉与勇气，他们既想用“西体”，又不敢革新“中体”，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虽然郑观应、王韬等人对此作了许多论证，但都没有从自相矛盾中解脱出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还是坚持既要“尧舜周孔之道”作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法度。由此可以得到结论，此时的“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论式所含内容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着洋务运动实践活动的变化，反映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的扩大和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内容的深化，虽然有关论证处于无法自圆其说的状态中，但应当说已经成为维新变法思潮的前驱先觉。如果说甲午战前“中体西用”文化观关怀的焦点是“富强之术”和“立国之本”的关系，那么甲午战后，其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开始普遍关怀“政”与“教”的关系，并着重从“教”的内涵来探讨“中体”的地位问题。这一议论重心的转移显然与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及战后知识界的认知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人认识、学习西学的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国人学习西学“是在‘中体西用’宗旨下起步的，而其本身又深深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用为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④“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中体’应是对‘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自身的要求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实际却很难如愿。”^⑤尽管如此，不能否认“中体西用”这一文化观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实践中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起了很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没有它，就没有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都不能算是取得了成功。

四

注释：

①② 龚书铎：《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启示》，《史学集刊》1994，4，第34—41页

③ 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奏议海防事宜，《洋务运动》（六），第206页

④⑤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20页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

责编 马俊青